

B5-148C,

贝克莱 思想新探

阎吉达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41
5

15-4815

貝克萊 思想新探

羅賓遜著 王德安等編譯



贝克莱思想新探

阎吉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贝克莱思想新探

阎吉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印张 5.75 字数 146 千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7-309-00033-1 / B · 02

统一书号: 2253 · 020 定价: 1.25 元

序 言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是英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欧洲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最大代表。终生从事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论证宗教神学以及宣传宗教教义的活动。其哲学思想对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对不同时期出现的新老实证主义者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他们炮制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绪论中,把贝克莱称之为“老牌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这一“老牌唯心主义者”同后来受他思想影响而出现的各种新牌号的唯心主义者一样,也力图掩盖自己的哲学倾向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东西。但在他那里也有不同于后来的各种“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这就是他直率而又明确地反对唯物主义哲学对于物质客观存在的承认,把物质说成是“虚无”。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心中的观念,而物只是“观念的集合”。除此之外,还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认识路线,称唯物主义者把人的认识(观念)说成是对在本性上不同于认识(观念)的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犯了“二重化”的错误。贝克莱的这种作法也诚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绪论中所说的,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相比之下,在贝克莱之后产生的各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家,虽然也力图最终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和认识的客观来源,但他们所采取的手

法却狡猾得多,隐蔽得多,常常打着反对“形而上学”或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旗号来设法实现自己的图谋。这一不同点的存在,或许正可以把新老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但这一区别毕竟只是外在的或形式上的。

我认为,学习和了解贝克莱哲学的实际意义,除了通过对其唯心主义的思想内容的分析批判,和对其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的探究,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和增强我们识别和批判当代各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能力。

说到对于贝克莱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我觉得,总的说来,虽然一向我们还是比较重视的,但也存在着不够之处。这主要是,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缺少发展变化的观点。在一些有关欧洲哲学史的论著中,它们对贝克莱哲学思想的论述,常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贝克莱在建立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后,其哲学思想一直没有变化。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形是,在几十年的哲学理论生涯中,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后来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后的哲学虽然在本质上依然是唯心主义,但已不再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形态,而表现为二元论的形态了。

其实,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终生不变,就是它的形成也不是没有一个过程的。以前人们认为,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形成和出现于《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海拉和菲伦诺的三篇对话》(1713)等三部著作中。经过对贝克莱早期著作的考察,我们发现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出现和形成要远早于上述三著问世的时间,在1707—1708年间陆续写于两本簿子上,为数数百条的札记性的哲学笔记中,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便已初步形成。而据贝克莱在笔记中所说,他的这些哲学观点在写作哲学笔记之前,已酝酿了长达八

年的时间。

我觉得，既然贝克莱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形成到发展完善，再到变化为他种形态的过程，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思想，也就理应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追踪研究和论述它的全过程。这种考虑可以说是我写作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动机和目的。

另外，通过这本小册子的写作，也想比较全面地论述一下贝克莱的整个思想体系。过去，在我国思想界，贝克莱只是被看成一位哲学家和宗教神学家。实际上，他作为一位很有独创性的人物，思想涉及的方面是很广的。除了哲学、宗教神学的领域之外，在政治、经济、伦理、美学等领域内，也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贝克莱的思想理论活动既然是多方面的，那么在我们对于他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作中，也就应当改变过去把研究范围只限于其哲学和宗教神学思想方面的偏向。这样做，也不仅同样是还思想家以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全面而正确地评价和认识贝克莱在欧洲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很必要的。除此之外，按照历史的实际，全面研究和论述贝克莱各方面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和把握、主要作为哲学家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贝克莱的哲学思想。这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同其他方面的思想是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我个人虽然力图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贝克莱的哲学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思想作点全面的探索工作，但由于水平有限，在对问题的看法和论述中，一定会存在不少不当，甚至错误的地方。热诚期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所处时代、生平和著作	1
一、	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1
二、	生平和著作	4
第二章	哲学思想的一般特征和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23
一、	哲学思想的一般特征	23
二、	《哲学评论》	27
三、	《视觉新论》	35
第三章	哲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39
一、	哲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39
二、	对责难者的答复	46
第四章	对唯物主义的物质客观存在学说的反对	53
一、	“先验地”论证物质不存在	53
二、	“后验地”论证物质不存在	64
第五章	哲学思想受到的反对和批判	81
第六章	哲学思想的变化	90
一、	在世界观上,从主观唯心主义趋向二元论	91
二、	在认识论上,从经验论转向唯理论	96
三、	坚持反对抽象观念的学说	101
第七章	社会政治、经济思想	110
一、	“消极服从”论的政治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110

二、具有应用价值的经济学思想	115
第八章 伦理、美学思想	125
一、伦理思想	125
二、美学思想	136
第九章 宗教神学思想	139
一、看重宗教的社会作用	139
二、论证上帝的存在	141
三、辩护基督教的神圣性	143
附 录 论运动	149

第一章 所处时代、生平和著作

一、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贝克莱生活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上半叶。这时，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取得了国家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正积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时，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广大被剥削被奴役的下层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是被推翻，但尚不甘心灭亡的旧的封建贵族阶级。由于这一时期“光荣革命”刚刚过去，被推翻的封建旧贵族势力一直蠢蠢欲动，试图复辟，因此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还没有完全转变为掌权的资产阶级同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资产阶级同刚被推翻，但又试图复辟的旧封建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要更尖锐一些。这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劳动人民群众反抗政府当局的起义，可是在同一时期给政府当局带来严重威胁的封建势力的复辟叛乱活动，倒是发生了两起。一起发生在1715年年底到1716年年初，一起发生在1745年年底到1746年年初。这两起封建复辟活动都是由被“光荣革命”赶下台的，封建专制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后裔和追随者策划和发动的。它们前后均经历了数月时间，卷入的叛乱者也均达万人左右。

对于英国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浸透着宗教精神的阶级来说，在考虑如何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时，是十分看重宗教对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一般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思想麻醉作用的。

贝克莱就曾公开作出这样的声称：“一个灵魂如果透彻地、了然地彻底感觉到全能精神的遍在、圣洁和正义，则他绝不会怙恶不悛，毫无羞耻地触犯他的法律”，而只会产生“戒慎之心，恐惧之念”，安分守己地忍受别人的统治和奴役¹。

但是在贝克莱所处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要想如愿以偿地利用从封建统治阶级那里继承过来的传统的旧宗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眼界扩大了，近代由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开创的无神论思想在社会上愈来愈得到传播。另外，还因为在当时英国社会上，自然神论思潮十分流行。宣传这种思潮的人被称之为“自然神论者”或“自由思想家”。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他们虽然一般并不公开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主张以理性来衡量和理解基督教的信条。在他们看来，凡是同理性相违的信条便不能被看成真理。这实际上是以“理性”为武器去反对和否定建立在迷信和盲目信仰基础上的、被称之为“启示宗教”的旧的传统宗教。不仅如此，自然神论者们还明确否认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还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干预。这种观点对传统的，所谓上帝时刻注视着俗人的一言一行，奖善罚恶的宗教说教，更是严重的打击。总的来说，以理性去反对盲目信仰，特别是否认上帝会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万事，这使得自然神论这种理论形式实际上具有无神论的性质。也可以说，它是在一向浸透着宗教精神的英国的社会条件下，在近代出现和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无神论。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特殊形式的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和流行，更加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动摇和改变着他们原有的宗教观念。这种情况在1728年出版的《乔治二世宫廷的回忆录》[作者为洛德·赫维(Lord Hervey)]一书中有所反映。书中提到，由于自

¹ 见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下同），第93页。

然神论的广泛传播和流行,当时在英国,“基督教的神话”被戳穿,传统的信条不再被看成神圣的了。如此以来,不只是下层社会的人,就是上层社会的人,也都普遍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这就如同以前他们羞于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样。

显然,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和保持基督教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使得一般社会成员继续保持宗教观念,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教会部门,就需要动员和组织力量,在对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思潮进行反扑和围剿的同时,对基督教的信条进行新的辩护和论证的工作。

贝克莱正是适应统治阶级的上述需要,在十八世纪初叶登上了英国历史发展的舞台。在政治思想上对现有政权全力支持的贝克莱,一向不遗余力地攻击和反对无神论和自然神论,设法对基督教的传统信条作出新的辩护和论证。不仅如此,在长期以来为基督教神学效劳的经院哲学业已瓦解的形势下,他还以主要精力从事哲学理论活动,企图创立新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形态,为宗教神学提供它所需要的哲学论证。

我们还要看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在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积聚愈来愈多的金钱财富,因而对于有助于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热衷的。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特性和愿望也促使身为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贝克莱,花费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当然,在后面具体论述贝克莱的经济思想时,我们将会看到,促使贝克莱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主要动力,还是在于,他怀有迅速改变爱尔兰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

在贝克莱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思想也各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贝克莱一生并没有写过专门的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但他在这两门科学领域中所提出的思想却很有价值。贝克莱对伦理学和美学也有所涉猎,主要原因是,他与之论战

交锋的一批自然神论者或自由思想家们，在包括伦理学和美学在内的许多思想领域内进行活动或进行着自由讨论，而这些方面的活动或对问题的讨论，常常又总是同政治、宗教神学和哲学相关联着的。这不得不迫使贝克莱扩大他从事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二、生平和著作

贝克莱的一生活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685—1712年为早期阶段；1713—1734年为中期阶段；1735—1753年为晚期阶段。早期阶段是在爱尔兰度过的。在这阶段，贝克莱着重于哲学思想的研究，并酝酿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中期阶段，贝克莱主要生活于当时英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中心地伦敦，并以之为据点进行大量实际活动。如先后两次旅游欧洲大陆，准备并进行了他的“百慕大计划”。晚期阶段则基本上在爱尔兰度过。在这一阶段，贝克莱除了从事医疗方面的实践活动外，主要精力和时间用来著书立说。

早期阶段

乔治·贝克莱于1685年3月12日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Kilkenny)邻近托马斯城(Thomastown)的戴塞特城堡(Dysert Castle)。他祖籍英格兰。他的父亲威廉·贝克莱(William Berkeley)曾担任税吏，同斯特拉顿的贝克莱勋爵(Lord Berkeley of Stratton)(1670—1672年任爱尔兰总督)有亲属关系。据说威廉·贝克莱是作为贝克莱勋爵的随员从英格兰前来爱尔兰的。他的妻子是爱尔兰人，夫妻二人生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乔治·贝克莱是长子。

贝克莱于1696年7月进入基尔肯尼学校读书。后来成为他

的终生密友和通信人的托马斯·普赖尔(Thomas Prior)就是他在这所学校中的一位同学。1700年3月贝克莱进入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的学习内容是多方面的,除学习神学外,还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和法文等语言,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光学等自然科学。在哲学上对当时在英国十分流行的洛克的经验论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曾与一些同学组织过一个洛克学说研究会。1704年大学毕业后,经过三年的努力,被授予文学硕士的学位,并于1707年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员和指导教师的职务。随后又陆续担任过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希腊语教师和副学监等职务。1710年被授予爱尔兰国教会牧师的圣职。后来为了在伦敦联系出版自己的《海拉和菲伦诺的三篇对话》,也为了结识英国思想界的名流,并同他们交流学术观点,贝克莱于1713年1月第一次远离爱尔兰,来到当时英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中心伦敦。

在早期阶段,贝克莱写作并出版了体现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三部主要著作。其中,《视觉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出版于1709年(都柏林),《人类知识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出版于1710年(都柏林),《海拉和菲伦诺的三篇对话》(以下简称《三篇对话》)出版于1713年(伦敦)。在这三部著作中,又以《原理》为最主要的代表作。体现贝克莱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的基本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即出现在这部书中,并且在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证。《新论》的写作可被看成写作《原理》的一个预备步骤。在该书中,贝克莱表面上没有全盘否定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只是从对视觉的考察出发,局部否定视觉对象的客观性。《三篇对话》则以通俗的对话形式,进一步解说和论证了贝克莱在《原理》中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需要予以指出的是,贝克莱在他生活的早期阶段,虽然出版了上述三部体现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著作,但是在写作这三部

著作之前，他已作了大量思想理论上和材料上的准备工作，这便是，在1707年的夏天至1708年的秋季，写了两大本有关哲学方面的笔记。这些笔记是以条目的方式写的。共有888条。内容大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前人，特别是对十七世纪以来，在西欧地区出现的诸如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马勒伯朗士等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评判，另一方面，则记录了自己在一年的时间内不断酝酿形成的各种哲学观点和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写作哲学笔记期间已大体形成。

贝克莱的哲学笔记虽然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内容，但或许因为它只是一些零星的随感和札记，因此贝克莱生前一直没有将它出版。笔记的首次出版，是在贝克莱死后已达一百余年的1871年。当时发现这些笔记的是爱丁堡大学的教授、著名的贝克莱思想研究家弗雷塞(A. C. Fraser)，他将笔记收入由他编辑的贝克莱全集克拉伦登版(Clarendon)第4卷中，给笔记起的书名为：《偶然产生的形而上学思想札记簿》(Commonplace Book of Occasional Metaphysical Thoughts)。从这一书名也可以看出，贝克莱的哲学笔记在初次出版时尚未引起人们的多大重视。这种情况或许同弗雷塞把两本笔记的前后次序弄颠倒，以致影响他对贝克莱在笔记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理解有关。1944年，这些笔记由都柏林大学的鲁斯(A. A. Luce)教授重新出版。鲁斯不认为贝克莱的哲学笔记只是寻常的“札记簿”，而认为它们是对贝克莱在思想上已形成的“非物质主义”所作的自我“评论”。由此之故，鲁斯便将书名改为《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Commentaries)。这一新的名称很快被学术界普遍加以接受。后来在由鲁斯和杰索普(T. E. Jessop)主编的《贝克莱全集》(1948—1957年伦敦版)中，《哲学评论》被收进第1卷。这里需要指出一点：鲁斯把贝克莱的哲学笔记，说成只是贝克莱对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

想的“评论”，这也有些不太确切。因为，如上所述，对近代在西欧各国出现的许多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作出评判，这也是笔记的重要内容。

在早期阶段，贝克莱在以主要精力开展哲学研究的同时，对社会政治问题也是很关心的。1712年，他出版了《论消极服从》(Discourse on passive obedience)一书。在这之前，他曾于1711年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作过三次讲道。《论消极服从》便是对这三次讲道的内容加工整理而成的。书中主要论述了臣民与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的关系。贝克莱的主张是，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国王的统治。如同后面在专门论述贝克莱的社会政治思想时，我们将要指出的，贝克莱提出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确是为维护现存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但也应看到，他的这一主张同当时洛克的主张是相反的。洛克为了给前不久结束的“光荣革命”进行辩护，主张对国王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即只能服从那些维护臣民的利益的君主的统治，而对于专制统治则可以拒绝服从，甚至应该反抗。正因为贝克莱同洛克的政治理论相抵触，所以他的讲道曾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议论，不少人怀疑贝克莱在政治上是被“光荣革命”推翻的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他的讲道是为封建王党的复辟活动服务的。贝克莱认为，这是对他的误解。在书中所载的“告读者信”中，他阐述了自己向三一学院的青年学生作关于“论消极服从”讲道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洛克提出一种理论，主张臣民“对政府的服从”，应以政府能保证臣民的利益为前提，否则臣民便有权对“最高统治当局”进行反抗。这种理论“近几年来，经过辛勤地培育”，在社会上很为流行。而贝克莱认为，洛克的这种基于社会契约论而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于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是十分有害的。为此，他决定向学生们作“论消极服从”的讲道，以期肃清洛克的理论对青年们的“毒害”，更好地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他提出，之所以要把三次讲道整理出版，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公正地评判他作讲道的目的

和意图。

年轻的贝克莱尽管作了如此的努力和申诉,但是当时在位的爱尔兰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他一直怀有戒心。例如1716年,尽管有英国皇太子的推荐,贝克莱这位在当时英国思想界已颇有名气的人物,却无法在都柏林获得一个很普通的、享有薪水的牧师职务。

中期阶段

旅居伦敦

1713年1月,年岁尚不满三十的贝克莱从爱尔兰到达伦敦后,受到了他自己未曾预料到的学术界人士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许多知名人士都乐于同他会见和交谈。国王也接见了,并且对他十分恩宠。这里可举一例。贝克莱原先只打算离开他任职的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几个月,但后来因为想在伦敦多住一段时间,便要写信向学院告假。替贝克莱写告假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英王。告假一次只准假两年。贝克莱前后在外时间长达八年,这样,就要写几次告假信。而这几次告假信均由英王所写。

贝克莱在伦敦受到热烈欢迎,主要归功于他的《新论》,特别是《原理》的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贝克莱提出的一系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命题,虽然实际上很少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年轻的贝克莱对宗教事业的一片忠诚,对学术理论问题能提出崭新的独特见解的精神,以及其对论点进行周密论证的能力,却使许多人钦佩不已。

贝克莱在当年的10月份启程去意大利旅游之前,除了短期赴牛津参观之外,其余的时间均是在伦敦度过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是活动于聚集在伦敦的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中间。其中与之